

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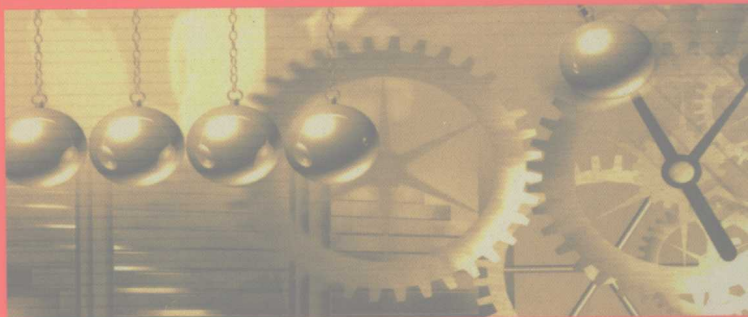
与

chuancheng
yu
chuangxin

上海大学出版社

创新

CHUANGXIN ◎ 杨俊一 主编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传承与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研究

杨俊一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与创新/杨俊一主编.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1058-968-7

I. 传... II. 杨... III. “三个代表”思想-研究
IV. D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6957 号

责任编辑:姚铁军·欧阳华

封面设计:王春杰

责任制作:章 斐

传承与创新

杨俊一◎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16 印张:35.5 字数:695 千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8-968-7/A·010

定价:68.00 元

传承与创新:矛盾思维、实效思维与创新思维 (代前言)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创新的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作出新的理论贡献,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典范。

在当代中国,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过程表明,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永葆生命活力的源泉。

从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角度看,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科学判断我们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对当今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对

党的现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①

从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宣传和学术阐释的角度看,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理论谱系,既有“实事求是”精髓的一脉相承,又有各自理论创新的学理特色。为了突出这些特色的学理范式,以思维范式为视角,可以把三者的学理特色简括为:毛泽东——矛盾思维范式;邓小平——实效思维范式;江泽民——创新思维范式。

一、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思维范式:矛盾思维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总结,但从思维范式的角度,阐释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思维范式,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承和创新意义的理解,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思维范式类型”意义的理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化,这些“思维范式类型”会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库”。它启示着后继者“做什么”、“如何做”、“为谁做”的价值选择半径。而这一过程,体现着理论创新的规律。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

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创新的分析,可以从毛泽东的著名论文《改造我们的学习》入手。

笔者以为,自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以来,学者们更多是围绕着这篇文章,阐释“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三个命题间的关系,并把三者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其世界观、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意义。这种做法对于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分析毛泽东的文本思维方式的特殊性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结合毛泽东《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其他论述,“吾道一以贯之”的哲学命题,揭示毛泽东实事求是观的理论系统,矛盾思维方式及其二重化的特征,才有可能有效地阐释毛泽东“文本”思想的时代意义和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历史性。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第5—10页。

(一) 毛泽东实事求是观的展开系统

就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命题的内在要素而言,其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实事”,即客观存在着一切事物;“是”,即事物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求”,即研究。对这三个要素进一步分析,可以有以下的等值命题:

其一,“实事”,即事物,即矛盾。矛盾即运动,即事物,即过程,即思想。从而,事物,即运动。

其二,“是”,即事物的内部联系、规律。事物内部联系的规律,就是“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区别和联系的规律。从而,事物的规律即事物的矛盾规律。

其三,“求”,即我们去研究。所谓的研究,有两义:其一,是主体研究事物的矛盾规律;其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因此,“求”的哲学本义是主观改造客观的实践。可见,“求是”的过程也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主客观矛盾关系的过程。

通过“实事”、“是”、“求”等值命题的学理分析表明,毛泽东实事求是观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矛盾分析。所谓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就是客观地分析矛盾规律的态度和方法。进而言之,从“实际情况出发”,即从客观存在的矛盾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即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二) 矛盾思维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事”

革命与矛盾思维的分析方法不仅是毛泽东解剖新民主主义革命“实事”方法,而且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

(1) 毛泽东“矛盾”概念的双重性及其方法论的实质。

首先,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在思维方式上的更加接近中国哲学“天道即人道”的思维

特点。矛盾规律不仅是自然规律,同时又是社会规律。矛盾概念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不同。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上,毛泽东更加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对特殊矛盾分析方法的贡献,就无法正确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实际”。

其次,在毛泽东的“文本”思想中,对矛盾概念逻辑形式的叙述特征基本是方法论上“一分为二”的陈述体系,而不是本体论的演绎体系,由此,凸现了矛盾概念“两分法”的方法论倾向。这一点从根本上区别于黑格尔的《逻辑学》。

在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上,在毛泽东的“文本”思想中,更多地强化了斗争性的主导地位。它给读者留下的阅读空间,是矛盾的斗争性

与现实阶级斗争命题置换的等值意义。

(2)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事”的矛盾分析,即“阶级分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矛盾分析的现实内容就是阶级分析。二者在历史上是一体化的。因此,“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是从主观出发,而是从客观“实事”出发的分歧。因为谁也不会从主观出发,只是对“实事”的看法不同而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究竟谁所揭示的“实事”是客观的,则根本取决于谁掌握了“矛盾——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掌握了这一方法,所以它能揭示出,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革命的主体,谁是可联合的对象等一系列“实事要素”,并从中揭示出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基本任务等规律。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掌握“矛盾——阶级”一体化的分析方法,想做到“实事求是”也是不可能的。

(3) 矛盾思维与社会主义建设“实事”。按照通行的看法,毛泽东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是由于其没有“实事求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晚年“文本”的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仍然强调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强调要从实践经验出发;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甚至要推广“蹲点”调查的方法。

那么,究竟怎样解释,其一方面强调“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又犯主观主义错误的矛盾现象?

笔者以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动力,主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特殊矛盾的分析 and 阶级矛盾的分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同构的。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殊矛盾和阶级斗争一体化的分析方法,由于历史过程的更替,失去了它的普遍或基本的意义。一方面,由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分析就失去了它的本体论的基础;另一方面,对矛盾“一分为二”分析的思维方式,由于阶级斗争处于次要的地位,失去了它现实应用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单纯的矛盾分析,要么显得过于抽象,或仅局限观点加例子的水平;要么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充满着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阶级分析”的方法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解释“新时期”的客观“实事”。因为,所谓的从“实际”出发,不过是从“一分为二”分析后的阶级斗争的“实事”出发;所谓的调查研究,不过是对阶级斗争调查基础上“一分为二”的研究。因此,从这种“实事”中,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只能是一种“主观设定的规律”。在实践中,也必然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由此表明,要想揭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实”,并从中概括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必然创造性地提出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

二、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实效思维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在本质上是继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做到,或用什么样的方法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要进行思维方式的理论创新。

(一) 实效思维方法论的创新

1. 问题的提出与实效思维的方法论界定

本文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阐释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是因为《邓小平文选》毕竟只有三卷,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却是面向未来的、开放的,需要不断的创新。因此,仅仅记住《邓小平文选》的结论是不够的,只有把邓小平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才能够在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笔者以为,邓小平的理论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与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不同的,具有创新水平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实效思维。

所谓的实效思维,归根到底,也是实事求是的思维。其方法论的内容,是对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思维方法上的概括。根据笔者的理解,它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开放战略思维的基本方法。

2. 实效思维的基本要求及其操作条件的分析

(1) 实效思维的第一要义,是不搞争论。不搞争论不是否定争论的存在,而是实效思维的操作要求。

其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试验,“本本”上没有,实践中也没有符合中国实际的成功范例,只能通过实践检验效果,“拿事实来说话”。

其二,在效果检验之前,进行无实效的争论,无疑会增加意识形态上的“交易成本”,增加改革开放的“摩擦费用”,既然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路是正确的,没有理由不进行“解放思想”、“大胆地试”、“步子要稳”的试验,成功的效果自然会有理论效应,以“总结”代替“争论”,更有效率。

(2) 实效思维,对实际问题的操作分析。实效思维要求在复杂的事实面前,首先确定可操作的问题。

CHUANCHENG YU CHUANGXIN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较多,但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带来实效,并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用邓小平的话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首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确定了可操作的问题,然后一步一步地试验,一点一点地解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的“摸论”,“摸什么”?不是瞎摸,而是摸实效。怎样才能摸到实效,就是邓小平的“猫论”。不管黑猫、“黄猫”,摸到耗子就是好猫。

规范地说,邓小平思维方式的操作分析方法,在形式上,包括“问题——实验——调整——定性——推广”几个环节。在内容上,包括“实际效果、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等等。”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构成了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特点。他指导人们,一切从实效出发,一切以实效为标准,“不搞争论”、“大胆地试”、“试验成功”就定型、推广。从深圳、珠海、内地乃至全国。

3. 实效思维操作化分析的方法论特点

(1) 定性分析定量化。在邓小平的理论中,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量化的依据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50 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没有摆脱“贫困”状态。

(2) 社会发展“工程化”。它不同于社会发展运动化,而是强调对社会发展的合理设计,建构“渐进”的社会工程蓝图,一步一步地完成量化的阶段性指标,并通过不断地调整,最后实现社会工程的平衡,协调发展。

(3) 社会发展目标“统计科学化”。首先,邓小平是用了能够科学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相对水平综合标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规定其渐进的社会工程目标。其次,总体的目标的分解为各个阶段的量化指标:500 美元、1 000 美元、4 000 美元。最后,阶段性的目标操作化,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6% 就可以实现。

(4) 社会理想实证化。从“小康阶段”到“中等发达”的社会具有实证化的量化标志。衡量其社会发展水平,不是理想化的“美文学”的描述,而是量化性的标志,当中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的时候,属于世界前列。

4. 实效思维的“理论案例”分析

所谓的“案例分析”,是把《邓小平文选》作为文本,侧重其中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方案的设想、评价的实效分析,其逻辑分析的程序如下:

(1) 为什么:中国为什么走改革开放之路?

其一,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决定的。邓小平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的“闭关自守”所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中华民族的贫困落后。“如果从明朝算起,到鸦片

战争,有三百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其二,是中国现代经验决定的。建国后“左倾”的指导思想和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导致的效果不好——很长时间处于缓慢的停滞状态,人民生活还是贫困。”

怎样摆脱贫困?唯一出路是发展生产力,采取何种手段?唯有改革开放。

(2) 应如何?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步骤设计是,“农村包围城市”。他说,“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实践表明,只要“开放”,就能“很快收到效果。”

(3) 如何评价?“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以生产力为评价标准,所看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这样一下子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面貌就改变了……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城市的改革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怀疑都取消了。”

总之,《邓小平文选》实效思维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摆脱贫困——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大胆地试——一切看实效。这就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二) 实效思维发展观的创新

笔者以为:邓小平理论创新之一,就是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思维公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条的社会主义

应该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般社会主义”的重复,而是怎样搞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提出、论证和发展上,因此,不能把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传统意义上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离开“特色”,无所谓社会主义的创新。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开放是特色,”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因此,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实际是改革开放的创新。

1. 邓小平的创新发展观

创新发展观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二次革命论的概括。即“解放思想、不怕风险、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其基本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创新的指导思想是:不在创新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指出,“世界的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不以新的

思想、观念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只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2) 创新的价值信念,是摆脱贫困,创造“富裕”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文选》中,反复批驳“四人帮”“要——不要”的荒谬公式,不断强化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价值渴求,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为,“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

(3) 创新的实质是改革“人为构建的生产关系”。下放权力,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高生产效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

(4) 创新的风险意识是大胆试验,不怕风险,及时纠错,稳步前进。用邓小平的话说,“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大事”,既然是新生事物,难免会要犯错误,百分之百的正确是没有的。但步子要稳,及时发现和纠正,以避免较大的损失,增加风险成本。

(5) 创新的目标模式是先实现“小康社会”,然后是一步一步地达到“中等发达的社会”。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4 000美元,使中国的社会状况由不发达阶段发展到较发达阶段。

(6) 创新的目的之一,是使党和行政机关以及整个国家体制增加活力;其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其三,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归根到底是提高生产力,增加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 邓小平创新发展观多维表现

邓小平创新发展观作为完整的创新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实事求是观创新。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邓小平并非简单地重复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有所创新,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提。这一并提的创新意义在于,强调了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邓小平这一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创新论断,具有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意义:

就实践的创新意义而言,不解放思想,就无法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就不敢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无法进行改革开放。一句话,就不敢使思想符合实际。就理论的创新意义而言,思想符合实际也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一般地说,任何人,要正确地认识事物,都不会有意地从主观想象出发,都会本能地认为自己是“从‘实事’出发”,这是日常意识的习惯心理定势。

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为什么 A 的事实是客观的,而 B 的事实是主观的呢?具体地说,为什么 A 认为,深圳的事实是姓“社”,B 认为深圳的事实是姓“资”呢?可见,思想符合实际还有一个思维方法问题。以实效思维为依据,其思想符合的“事实”就是客观的,以教条主义的思维为依据,其思想符合的“事实”,就是主观的。因此,仅知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怎样做到实事求是,那就是“解放思想”。

(2) 改革观的创新。邓小平的改革观作为第二次革命观,对社会动力机制的认识与“过去那一套”不同,更多地强调社会活力形式的多元互补性,强化活力形式的实际效果,它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实现经济主体价值目标的形式。任何有助于经济主体提高经济效益的管理形式,都是有效的形式,在改革中,就可以大胆地试。以实效功能为尺度,管理形式必然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的管理形式,谁能提高生产效率,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大胆试验的形式。用邓小平的话说,它们都是手段。

其二,激励经济主体的形式。任何有助于生产者积极性的分配形式,都是合理的形式。不论是“均等分配”“按能力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按贡献分配”等等,谁有实效,谁就是可以取得支配地位。

其三,问题不在于简单地说是或否,而是如何发挥其实效,使之从不完善到完善,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看这样的问题要重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3) 开放观的创新。邓小平开放观的创新表现在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

首先,对内是开放与放权的统一。对内开放的目的是搞活,搞活的措施是放权。特别是要给基层以更多的自主权,让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以此为依据,开放就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内在相关。可见,对内开放是全面开放。

其次,对外开放,是用“大开放”代替“小开放”。笔者以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观,更具有革命性的。因为它提出了全新的“大开放”理想。它不同于传统的“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小开放”的观念。因为,“小开放”无非是“外国的东西走进来”,而“大开放”,则是中国的东西走出去。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就更困难。

CHUANCHENG YU CHUANGXIN

(4) 发展观的创新:邓小平的发展观实质是突显了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社会结构变迁的有序性。它与那种“大跃进”式的推动生产关系突变的发展观不同,强调生产力量的积累,各种关系的平衡,协调发展,而不是利益的冲突,权利和义务的失衡所形成的爆发式的社会运动。邓小平强调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靠合理的设计、部分的改造、利益协调、目标量化,渐进地实现总的社会进步。因此,必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策”的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但经济安全要以提高生产率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才会形成“安全”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所以说,发展是硬道理。

然而,整个社会在其长期的渐进发展过程中,不排除个别阶段的高速度,“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但要讲实效,“不是孤立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实效,稳定协调的发展。”

(5) 民主观的创新。邓小平民主观的创新,主要集中于经济民主观的创新上。邓小平的民主观反对“大鸣、大放、大字报”所谓的民主运动,而是强调经济民主化。所谓的经济民主化,其基本内容,是改变过去经济管理权力分集中的体制。要有计划,大胆地放权,使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力,特别是放权给企业和生产队。把经济自主权提高到民主观的高度上来认识,是邓小平的首创,即把经济自主权和责任制的结合,看作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其理论的意义在于阐释了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所谓的民主,最基本的解释是,“人民的自主权力”。如果人民群众连这一自主权力都没有,那么政治上的权力对他们来说,就是抽象的,空洞的,乃至强权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事实表明,人民只有首先在经济上获得权、责、利统一的自主权,才会在政治上自觉地要求依法从事经济活动的义务,才会试图合理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在经济面前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彻底实现。

三、江泽民的理论创新:创新思维

当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向世人宣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又迎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江泽民在会见两院院士时指出,“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经济的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的变化,世

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信息经济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

迎接未来的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

根据江泽民对知识经济的理解所带来的思维张力,知识经济向人们所揭示的不仅是科技创新的时代,而且是社会各项事业创新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的时代。所以,江泽民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都要靠不断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必将是知识不断创新,新事物,新业绩不断涌现的时代。”总之,知识经济向人类所揭示的时代精神是“创新思维”即从“创新”的角度“进行思考”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1. 江泽民关于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创新的思想可以阐释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创新思维的哲学依据。江泽民指出,科学进步是无止境的,人类知识的创新也是无止境的。这是因为整个世界无论从宏观和微观都是无限可分的。这一点早就体现在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之中,庄子就曾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它表明,“中国远古时代的先人就已经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无限的。”人类只有通过不断的知识创新,才能认识这个世界,解释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2) 创新思维肩负着知识创新的双重使命。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以这样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智慧为底蕴的现代科学工作者,“应该进一步弘扬我们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当代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们的创新能力。”他具有现实和历史的现实意义:其一,他决定着“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其二,他决定着是否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 创新主体是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的青年人才。江泽民指出,“纵观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的发现和发明,都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时期,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这是由于“年轻人不但思维敏捷,精力旺盛,而且对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掌握也最快捷,又最少包袱,敢想敢干,新的创造出现于青年时期居多”。因此,我们要想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步伐,“必须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推动社会发展。

(4) 创新不仅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是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主要动力。推而广之,创新是面向 21 世纪的思维方式。只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思考,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抓住机遇,快速、持续的发展。这是因为,知识创新的实质是智力创新,而智

力创新最终要体现为人的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能力作用的大小也要通过推动社会各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来检验。在此意义上,创新是经济、社会、人文,三位一体化的综合创新过程。

(5) 以创新为导向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时期方略,同时,也是实现我国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步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措施。正如江泽民所说,“回顾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展望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我们更加坚信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真理,更加坚定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 21 世纪,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 创新思维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

一般地说,知识经济是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但从世界经济互动发展的角度看,知识经济又是不同民族创新思维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竞争优势的经济。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说到底,也是不同民族创新思维能力所表现出来社会发展力的竞争。

(1) 创新思维的经济学阐释。进入 21 世纪,熊彼特率先构建了经济学的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其组合的“新要素”包括五个方面,可以简括为三个层次,即创新技术、创新经营体制、创新组织形式。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演变为两个支脉,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并在创新管理中得到发展:创新不只是一种职能,而是一种创新思维的新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发展创新的机会;创新的目的是实现创新受益;创新的主体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创新者”。

(2) 创新思维的经济社会学的说明。在知识经济社会的条件下,创新思维的实现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其一,创新思维的心理定势是解放思想,抓住机遇。知识经济的社会是“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任何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同时就意味着创新和传播了与之使用方式相关的价值体认方式。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传统价值规制的束缚,才能有利于抓住机遇、适时创新。

其二,创新思维的主体应具有较高的资本存量。知识经济的主导是高科技的经济,因此,没有高人力资本存量,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是难有作为的。根据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高人力资本存量来自高人力资本投资,即来自教育、科学的高水平的投资。它是衡量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的“硬件”,在此意义上,创新思维是高成本,高收益的思维。

其三,创新思维也是开放型思维。知识经济也是“知识爆炸”的经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国家不可能垄断知识经济的创新边界,必须取长补短。因此,知识经济要求创新思维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此意义上,知识创新既是本国的,也是世界的,而只有世界领先的创新,才能获得“超额”的创新收益。

其四,创新的动力来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所谓的激励,是说创新思维要有回报;所谓的约束,是说创新思维也来自竞争压力。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创新思维的高效率在于形成动力和压力的良性循环机制。

其五,创新思维的价值取向是文化综合的创新。知识的创新固然和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思维有关。但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几乎都是以本土文化为底蕴,兼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才加速发展。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本世纪初的三次思想解放的三次创新,都离不开开放、开放、再开放,实事求是地进行文化综合的创新思维。

其六,创新思维的目标模式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创新思维,与一般哲学上讲“创造性思维”不同,它是对知识经济的社会如何进行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的概括,因此,它主要是怎样通过社会发展要素的“新组合”,加速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因此,他强调创新思维与增强综合国力竞争优势的实际相关性。而要实现综合国力的竞争优势,就必须使创新思维贯彻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创新的“基本纲领之中”。

3. 创新思维的综合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

从时代特征的角度,反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它是我们党面向21世纪历史方位提出来的科学判断。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使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坚持与时俱进,就要正确回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

CHUANGCHENG YU CHUANGXIN

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

社会实践所提出来的现实问题,即“四个如何认识”,需要结合实际给予理论上的回答。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世界局势的判断,社会实践的理论反思以及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解决,都要求我们党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所形成的基本结论就是:

我们的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的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就要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它要求我们的党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又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这一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即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总之,从毛泽东的矛盾思维、邓小平的实效思维到江泽民的创新思维,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变迁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的共产党人,所面对的社会实践所提出来的社会现实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进行思维方式的创新。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一新的思维方式的创新,将以“和谐思维”的方式集中表现出来。